

# 完善个人收入监控机制势在必行

■ 记者手记

年内第三次加息或至

□本报记者 王辉

在上周1年期、3月期央票发行利率分别走高9.61、8.17基点后,本周央行发行的两期央票再度分别上行9.63、8.16基点。其中,1年期央票发行利率已超出当前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近25基点。作为银行间市场的一个关键利率标杆,以及过去多次加息之指出的先行信号,此间观察家之前指出在1年期央票发行利率连续两周上行并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形成大幅倒挂后,年内第三次加息可能已经进入倒计时。

伴随着6月以来多地猪肉价格的大涨,新的食品价格上涨因素进一步涌现。根据目前市场主流机构的预期,6月CPI同比增速预计将达6%或以上,通胀压力中短期内仍将高企。而为应对通胀,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央行的货币政策手段已经“火力全开”,其中准备金率手段更已屡次动用。

在准备金率方面,央行从去年以来已经12次批准,仅今年上半年就达6次。而值得注意的是,准备金率在带来商业银行体系内部资金面出现反常紧张状况等相对负面效应的同时,其对于通胀的抑制作用似乎并不十分明显。另外,在存款准备金率已达21.5%历史高位的情况下,其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已经不大。

而在汇率方面,今年以来人民币保持了较快的升值速度,近两个多月来更呈现出加速升值态势。尽管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外部输入性通胀压力,但在实体经济微观层面对许多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从这一点上说,在经过上半年的快速升值之后,后期继续大幅拓展人民币升值空间仍需权衡其对应的负面作用。

去年下半年以来,伴随着通胀压力的居高不下以及信贷的逐步紧缩,市场资金的脱媒化开始显著升温。商业银行体系外较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政策效用,也加大了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管难度,干扰了商业银行的存贷业务。而资金脱媒困局的一大关键原因,就是长期负利率状况的延续。事实上,伴随着高力度的数量紧缩,今年以来商业银行愈演愈烈的“通过理财来变相调高存款基准利率”。从这个角度而言,短期内实现加息,对于规范银行业经营秩序、有效缓解金融脱媒化困局,也将起到极大的正面作用。

回顾近年来货币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央票利率多次在加息之前先行走高。今年3月中下旬,在1年期央票发行利率持续高出定期存款利率20基点两周之后,央行于4月5日宣布了年内第二次加息。而此次1年期、3月期央票短短两周内连续两次上行,1年期央票更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形成大幅倒挂之后,加息信号无疑十分明显。另一方面,今年以来货币当局为应对居高不下的通胀压力,基本以每个月左右上调一次准备金率,实现货币政策的逐步紧缩。7月初,面对继续走高的通胀压力,年内第三次加息或如箭在弦。

在上周1年期、3月期央票发行利率分别走高9.61、8.17基点后,本周央行发行的两期央票再度分别上行9.63、8.16基点。其中,1年期央票发行利率已超出当前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近25基点。作为银行间市场的一个关键利率标杆,以及过去多次加息之指出的先行信号,此间观察家之前指出在1年期央票发行利率连续两周上行并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形成大幅倒挂后,年内第三次加息可能已经进入倒计时。

伴随着6月以来多地猪肉价格的大涨,新的食品价格上涨因素进一步涌现。根据目前市场主流机构的预期,6月CPI同比增速预计将达6%或以上,通胀压力中短期内仍将高企。而为应对通胀,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央行的货币政策手段已经“火力全开”,其中准备金率手段更已屡次动用。

在准备金率方面,央行从去年以来已经12次批准,仅今年上半年就达6次。而值得注意的是,准备金率在带来商业银行体系内部资金面出现反常紧张状况等相对负面效应的同时,其对于通胀的抑制作用似乎并不十分明显。另外,在存款准备金率已达21.5%历史高位的情况下,其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已经不大。

而在汇率方面,今年以来人民币保持了较快的升值速度,近两个多月来更呈现出加速升值态势。尽管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外部输入性通胀压力,但在实体经济微观层面对许多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从这一点上说,在经过上半年的快速升值之后,后期继续大幅拓展人民币升值空间仍需权衡其对应的负面作用。

去年下半年以来,伴随着通胀压力的居高不下以及信贷的逐步紧缩,市场资金的脱媒化开始显著升温。商业银行体系外较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政策效用,也加大了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管难度,干扰了商业银行的存贷业务。而资金脱媒困局的一大关键原因,就是长期负利率状况的延续。事实上,伴随着高力度的数量紧缩,今年以来商业银行愈演愈烈的“通过理财来变相调高存款基准利率”。从这个角度而言,短期内实现加息,对于规范银行业经营秩序、有效缓解金融脱媒化困局,也将起到极大的正面作用。

回顾近年来货币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央票利率多次在加息之前先行走高。今年3月中下旬,在1年期央票发行利率持续高出定期存款利率20基点两周之后,央行于4月5日宣布了年内第二次加息。而此次1年期、3月期央票短短两周内连续两次上行,1年期央票更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形成大幅倒挂之后,加息信号无疑十分明显。另一方面,今年以来货币当局为应对居高不下的通胀压力,基本以每个月左右上调一次准备金率,实现货币政策的逐步紧缩。7月初,面对继续走高的通胀压力,年内第三次加息或如箭在弦。

在上周1年期、3月期央票发行利率分别走高9.61、8.17基点后,本周央行发行的两期央票再度分别上行9.63、8.16基点。其中,1年期央票发行利率已超出当前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近25基点。作为银行间市场的一个关键利率标杆,以及过去多次加息之指出的先行信号,此间观察家之前指出在1年期央票发行利率连续两周上行并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形成大幅倒挂后,年内第三次加息可能已经进入倒计时。

伴随着6月以来多地猪肉价格的大涨,新的食品价格上涨因素进一步涌现。根据目前市场主流机构的预期,6月CPI同比增速预计将达6%或以上,通胀压力中短期内仍将高企。而为应对通胀,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央行的货币政策手段已经“火力全开”,其中准备金率手段更已屡次动用。

在准备金率方面,央行从去年以来已经12次批准,仅今年上半年就达6次。而值得注意的是,准备金率在带来商业银行体系内部资金面出现反常紧张状况等相对负面效应的同时,其对于通胀的抑制作用似乎并不十分明显。另外,在存款准备金率已达21.5%历史高位的情况下,其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已经不大。

而在汇率方面,今年以来人民币保持了较快的升值速度,近两个多月来更呈现出加速升值态势。尽管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外部输入性通胀压力,但在实体经济微观层面对许多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从这一点上说,在经过上半年的快速升值之后,后期继续大幅拓展人民币升值空间仍需权衡其对应的负面作用。

去年下半年以来,伴随着通胀压力的居高不下以及信贷的逐步紧缩,市场资金的脱媒化开始显著升温。商业银行体系外较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政策效用,也加大了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管难度,干扰了商业银行的存贷业务。而资金脱媒困局的一大关键原因,就是长期负利率状况的延续。事实上,伴随着高力度的数量紧缩,今年以来商业银行愈演愈烈的“通过理财来变相调高存款基准利率”。从这个角度而言,短期内实现加息,对于规范银行业经营秩序、有效缓解金融脱媒化困局,也将起到极大的正面作用。

回顾近年来货币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央票利率多次在加息之前先行走高。今年3月中下旬,在1年期央票发行利率持续高出定期存款利率20基点两周之后,央行于4月5日宣布了年内第二次加息。而此次1年期、3月期央票短短两周内连续两次上行,1年期央票更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形成大幅倒挂之后,加息信号无疑十分明显。另一方面,今年以来货币当局为应对居高不下的通胀压力,基本以每个月左右上调一次准备金率,实现货币政策的逐步紧缩。7月初,面对继续走高的通胀压力,年内第三次加息或如箭在弦。

在上周1年期、3月期央票发行利率分别走高9.61、8.17基点后,本周央行发行的两期央票再度分别上行9.63、8.16基点。其中,1年期央票发行利率已超出当前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近25基点。作为银行间市场的一个关键利率标杆,以及过去多次加息之指出的先行信号,此间观察家之前指出在1年期央票发行利率连续两周上行并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形成大幅倒挂后,年内第三次加息可能已经进入倒计时。

伴随着6月以来多地猪肉价格的大涨,新的食品价格上涨因素进一步涌现。根据目前市场主流机构的预期,6月CPI同比增速预计将达6%或以上,通胀压力中短期内仍将高企。而为应对通胀,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央行的货币政策手段已经“火力全开”,其中准备金率手段更已屡次动用。

在准备金率方面,央行从去年以来已经12次批准,仅今年上半年就达6次。而值得注意的是,准备金率在带来商业银行体系内部资金面出现反常紧张状况等相对负面效应的同时,其对于通胀的抑制作用似乎并不十分明显。另外,在存款准备金率已达21.5%历史高位的情况下,其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已经不大。

而在汇率方面,今年以来人民币保持了较快的升值速度,近两个多月来更呈现出加速升值态势。尽管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外部输入性通胀压力,但在实体经济微观层面对许多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从这一点上说,在经过上半年的快速升值之后,后期继续大幅拓展人民币升值空间仍需权衡其对应的负面作用。

去年下半年以来,伴随着通胀压力的居高不下以及信贷的逐步紧缩,市场资金的脱媒化开始显著升温。商业银行体系外较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政策效用,也加大了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管难度,干扰了商业银行的存贷业务。而资金脱媒困局的一大关键原因,就是长期负利率状况的延续。事实上,伴随着高力度的数量紧缩,今年以来商业银行愈演愈烈的“通过理财来变相调高存款基准利率”。从这个角度而言,短期内实现加息,对于规范银行业经营秩序、有效缓解金融脱媒化困局,也将起到极大的正面作用。

回顾近年来货币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央票利率多次在加息之前先行走高。今年3月中下旬,在1年期央票发行利率持续高出定期存款利率20基点两周之后,央行于4月5日宣布了年内第二次加息。而此次1年期、3月期央票短短两周内连续两次上行,1年期央票更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形成大幅倒挂之后,加息信号无疑十分明显。另一方面,今年以来货币当局为应对居高不下的通胀压力,基本以每个月左右上调一次准备金率,实现货币政策的逐步紧缩。7月初,面对继续走高的通胀压力,年内第三次加息或如箭在弦。

在上周1年期、3月期央票发行利率分别走高9.61、8.17基点后,本周央行发行的两期央票再度分别上行9.63、8.16基点。其中,1年期央票发行利率已超出当前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近25基点。作为银行间市场的一个关键利率标杆,以及过去多次加息之指出的先行信号,此间观察家之前指出在1年期央票发行利率连续两周上行并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形成大幅倒挂后,年内第三次加息可能已经进入倒计时。

伴随着6月以来多地猪肉价格的大涨,新的食品价格上涨因素进一步涌现。根据目前市场主流机构的预期,6月CPI同比增速预计将达6%或以上,通胀压力中短期内仍将高企。而为应对通胀,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央行的货币政策手段已经“火力全开”,其中准备金率手段更已屡次动用。

在准备金率方面,央行从去年以来已经12次批准,仅今年上半年就达6次。而值得注意的是,准备金率在带来商业银行体系内部资金面出现反常紧张状况等相对负面效应的同时,其对于通胀的抑制作用似乎并不十分明显。另外,在存款准备金率已达21.5%历史高位的情况下,其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已经不大。

而在汇率方面,今年以来人民币保持了较快的升值速度,近两个多月来更呈现出加速升值态势。尽管人民币的快速升值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外部输入性通胀压力,但在实体经济微观层面对许多出口导向型的中小企业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从这一点上说,在经过上半年的快速升值之后,后期继续大幅拓展人民币升值空间仍需权衡其对应的负面作用。

去年下半年以来,伴随着通胀压力的居高不下以及信贷的逐步紧缩,市场资金的脱媒化开始显著升温。商业银行体系外较大规模的资金流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政策效用,也加大了相关监管部门的监管难度,干扰了商业银行的存贷业务。而资金脱媒困局的一大关键原因,就是长期负利率状况的延续。事实上,伴随着高力度的数量紧缩,今年以来商业银行愈演愈烈的“通过理财来变相调高存款基准利率”。从这个角度而言,短期内实现加息,对于规范银行业经营秩序、有效缓解金融脱媒化困局,也将起到极大的正面作用。

回顾近年来货币政策的具体执行情况,央票利率多次在加息之前先行走高。今年3月中下旬,在1年期央票发行利率持续高出定期存款利率20基点两周之后,央行于4月5日宣布了年内第二次加息。而此次1年期、3月期央票短短两周内连续两次上行,1年期央票更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形成大幅倒挂之后,加息信号无疑十分明显。另一方面,今年以来货币当局为应对居高不下的通胀压力,基本以每个月左右上调一次准备金率,实现货币政策的逐步紧缩。7月初,面对继续走高的通胀压力,年内第三次加息或如箭在弦。

款人必须从收款人那里获得该纳税人的社会保障号,并在付款人要求用一笔费用或成本抵扣其收入前,向国内收入局(IRS)报告。这样资金的流动就能够被追踪,任何资金的收入能够被确认且所得税负债责任(以及估计税收的预扣)能够被确定。与美国相似,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丹麦、瑞典等许多西方国家都有这方面的规定。

印度强制执行人永久纳税人识别号制度,规定凡纳税人必须向税务机关申请一个个人账号作为纳税人识别号。这个账号将伴随纳税人一生,有助于印度政府监控个人财务往来资讯,使纳税人的各项收入无以遁形,一目了然。我国香港地区以居民身份证号作为纳税人识别号。

第二,普遍实行源泉预扣税制或支付方强制性预扣税制。美国实行支付方强制性预扣税制,该制度的重要特征是由付款人在源头预扣预计的税款,付款人有动机这样做,因为它是确认支付款为成本或费用的条件,这可用于减少其利润或收入;否则,成本或费用将不被接受,付款人的利润和收入将更高,导致付款人自己承担较高的税负。

日本税法规定,凡工资、薪金、利息、股息以及所得税法特别规定的其他所得,都必须由支付者在支付上述所得时源泉预扣所得税,并在预扣月份次月的10天内向政府缴纳预扣税。

澳大利亚除了对工薪实行源泉预扣税制外,还在1983年实行了指定支付制度,规定建筑、珠宝加工、木工、技术服务、汽车维修、清洁等通常

使用现金支付的行业在支付劳务和服务款项时按20%的税率进行源泉预扣。

第三,普遍实行现金交易报告制度,大力推行非现金结算,最大限度地控制现金交易。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我国的台湾和澳门地区均建立有覆盖社会各个行业的广泛的现金交易报告制度,无论是银行还是企业都必须承担向政府有关部门(比如反洗钱情报部门)进行现金交易报告义务。各国规定银行进行现金交易报告的资金下限,美国是1万美元,加拿大是1万加元,澳大利亚是1万澳元。另外,美国、加拿大等国还规定了客户对国税局的现金交易报告制度,美、加的《银行保密法案》规定,客户进行任何超过1万元的现金交易,都要填写一份现金交易报告(CTR),然后在15日内交国税局;若客户于同一日内,在不同的分行做现金交易超过1万元,也要报告。因此,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90%左右实行非现金结算(即转账结算),只有10%左右实行现金结算。

第四,普遍注重与银行、海关、雇主等第三方信息库的联网,以最大限度地掌握纳税人信息。在很多经济发达国家,税务机关为获取纳税人必要的纳税信息,实现了与企业、海关、银行、商店等各种涉及纳税人收入、支出、消费、储蓄、汇兑行为的单位的纳税人信息库联网,以最大限度地掌握纳税人的信息。例如,美国国内收入局装有一套“货币-银行-企业”的检查系统,它的数据库里储存着来自银行、企业和货币使用者的流动信息,每当有

款人必须从收款人那里获得该纳税人的社会保障号,并在付款人要求用一笔费用或成本抵扣其收入前,向国内收入局(IRS)报告。这样资金的流动就能够被追踪,任何资金的收入能够被确认且所得税负债责任(以及估计税收的预扣)能够被确定。与美国相似,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丹麦、瑞典等许多西方国家都有这方面的规定。

印度强制执行人永久纳税人识别号制度,规定凡纳税人必须向税务机关申请一个个人账号作为纳税人识别号。这个账号将伴随纳税人一生,有助于印度政府监控个人财务往来资讯,使纳税人的各项收入无以遁形,一目了然。我国香港地区以居民身份证号作为纳税人识别号。

第二,普遍实行源泉预扣税制或支付方强制性预扣税制。美国实行支付方强制性预扣税制,该制度的重要特征是由付款人在源头预扣预计的税款,付款人有动机这样做,因为它是确认支付款为成本或费用的条件,这可用于减少其利润或收入;否则,成本或费用将不被接受,付款人的利润和收入将更高,导致付款人自己承担较高的税负。

日本税法规定,凡工资、薪金、利息、股息以及所得税法特别规定的其他所得,都必须由支付者在支付上述所得时源泉预扣所得税,并在预扣月份次月的10天内向政府缴纳预扣税。

澳大利亚除了对工薪实行源泉预扣税制外,还在1983年实行了指定支付制度,规定建筑、珠宝加工、木工、技术服务、汽车维修、清洁等通常

使用现金支付的行业在支付劳务和服务款项时按20%的税率进行源泉预扣。

第三,普遍实行现金交易报告制度,大力推行非现金结算,最大限度地控制现金交易。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以及我国的台湾和澳门地区均建立有覆盖社会各个行业的广泛的现金交易报告制度,无论是银行还是企业都必须承担向政府有关部门(比如反洗钱情报部门)进行现金交易报告义务。各国规定银行进行现金交易报告的资金下限,美国是1万美元,加拿大是1万加元,澳大利亚是1万澳元。另外,美国、加拿大等国还规定了客户对国税局的现金交易报告制度,美、加的《银行保密法案》规定,客户进行任何超过1万元的现金交易,都要填写一份现金交易报告(CTR),然后在15日内交国税局;若客户于同一日内,在不同的分行做现金交易超过1万元,也要报告。因此,发达国家的经济活动90%左右实行非现金结算(即转账结算),只有10%左右实行现金结算。

第四,普遍注重与银行、海关、雇主等第三方信息库的联网,以最大限度地掌握纳税人信息。在很多经济发达国家,税务机关为获取纳税人必要的纳税信息,实现了与企业、海关、银行、商店等各种涉及纳税人收入、支出、消费、储蓄、汇兑行为的单位的纳税人信息库联网,以最大限度地掌握纳税人的信息。例如,美国国内收入局装有一套“货币-银行-企业”的检查系统,它的数据库里储存着来自银行、企业和货币使用者的流动信息,每当有

款额超过1万美元以上的现金交易时,税务局就能及时发现。发达国家在税收信息共享方面取得的成功是与健全的法律规定分不开的。例如,许多国家在法律上设定了第三方的信息提供义务,在所有OECD国家中,雇主都必须向税务机关提供资料说明其对雇员进行工薪支付的数额,多数OECD国家要求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向特定纳税人进行利息支付的信息。

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税收信息库共享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印度全国500多家税务机关已全部联网,该网络还和银行、重要消费场所、证券交易所等机构联网,税务人员有权调阅这些机构的账目,从而掌握纳税人的信息。

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采用纳税人永久单一税号,并与支付方强制性预扣税款制度相结合,可以将纳税人的身份证号作为个人的永久纳税号码。个人在取得工资、薪金和红利、利息等收入时,付款人必须从收款人那里获得其身份证号,并为收款人预扣税款,因为不这样,这笔支付款项就不会被税务局认可,从而不能作为成本或费用在收入中扣除。个人的所有收入和支出及财产等方面的信息都应归入到本人的身份证号中。

大力推行非现金结算,加强现金管理。现金交易是税收流失的重要途径。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普遍实行现金交易报告制度,广泛推广使用信用卡,大额支付活动必须通过银行进行

资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分配与激励制度等一整套的制度结构尚不成熟,体制障碍构成了创业的基本制度性约束。

当前,国内企业的经营压力越来越大,一方面,国有资本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垄断和要素控制力,民营资本缺乏应有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由于红利的减少、劳动力、土地和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使得许多行业的利润率越来越薄,一些原本做实体经济的民营资本移民意愿萌生。

因此,对于中国这个“橄榄型社会”大步转型的国家而言,如何通过更好的机制和更好的福利环境把财富(物质财富和人才财富)留住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议题。对于很多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而言,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打破垄断、制度保障的经济自由、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等,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应该扩大对内开放,通过制度安排让市场真正发挥其在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公平竞争,提高经济效率,降低中国整体宏观税负,构建有益于民间投资的经济生态体系,把中国的民间财富留住。

而把人才留住要靠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比如加大教育制度、就业制度以及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法规,构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和“藏富于民”的收入分配机制,为人才财富可持续发展扫除制度障碍,加快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教育培训政策,真正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战略上来。

应该说,国际移民与经济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人才全球化相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更反映了资源全球化配置的需要。然而近些年,中国如此之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所引发的“汹涌现象”值得高度关注,移民潮不仅造成了中国的财富流失、人才流失、税收流失、消费流失,更对中国“橄榄型社会”的建立造成深远的影响。

不断加速的“海外移民潮”与中国“低福利”的大背景有关。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国民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30%。比如,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2007年政府支出的福利支出(包括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等)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高达68.8%、58.7%、56.7%和57.1%,而我国2009年中央财政中的社保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分别为7.6%、2.7%、4.5%。

然而,对于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的倾向和成本而言,投资环境和创业环境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因素。投资移民最主要的还是看重发达国家相对宽松的创业制度环境,美国相对而言是快速发展的小型公司最理想的创业成长地之一。金融危机以后,为提高全球竞争能力,美国采取了诸多鼓励投资政策,如提供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提供劳务、投资和培训服务等。对于在非中心地区、边远地区和经济开发区投资的企业,美国政府还提供特殊的优惠政策。与之相比,国内与创业相适应的创业孵化体系、风险投

资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分配与激励制度等一整套的制度结构尚不成熟,体制障碍构成了创业的基本制度性约束。

当前,国内企业的经营压力越来越大,一方面,国有资本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垄断和要素控制力,民营资本缺乏应有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由于红利的减少、劳动力、土地和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使得许多行业的利润率越来越薄,一些原本做实体经济的民营资本移民意愿萌生。

因此,对于中国这个“橄榄型社会”大步转型的国家而言,如何通过更好的机制和更好的福利环境把财富(物质财富和人才财富)留住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议题。对于很多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而言,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打破垄断、制度保障的经济自由、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等,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应该扩大对内开放,通过制度安排让市场真正发挥其在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公平竞争,提高经济效率,降低中国整体宏观税负,构建有益于民间投资的经济生态体系,把中国的民间财富留住。

而把人才留住要靠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比如加大教育制度、就业制度以及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法规,构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和“藏富于民”的收入分配机制,为人才财富可持续发展扫除制度障碍,加快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教育培训政策,真正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战略上来。

应该说,国际移民与经济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人才全球化相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更反映了资源全球化配置的需要。然而近些年,中国如此之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所引发的“汹涌现象”值得高度关注,移民潮不仅造成了中国的财富流失、人才流失、税收流失、消费流失,更对中国“橄榄型社会”的建立造成深远的影响。

不断加速的“海外移民潮”与中国“低福利”的大背景有关。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国民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30%。比如,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2007年政府支出的福利支出(包括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等)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高达68.8%、58.7%、56.7%和57.1%,而我国2009年中央财政中的社保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分别为7.6%、2.7%、4.5%。

然而,对于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的倾向和成本而言,投资环境和创业环境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因素。投资移民最主要的还是看重发达国家相对宽松的创业制度环境,美国相对而言是快速发展的小型公司最理想的创业成长地之一。金融危机以后,为提高全球竞争能力,美国采取了诸多鼓励投资政策,如提供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提供劳务、投资和培训服务等。对于在非中心地区、边远地区和经济开发区投资的企业,美国政府还提供特殊的优惠政策。与之相比,国内与创业相适应的创业孵化体系、风险投

资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分配与激励制度等一整套的制度结构尚不成熟,体制障碍构成了创业的基本制度性约束。

当前,国内企业的经营压力越来越大,一方面,国有资本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垄断和要素控制力,民营资本缺乏应有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由于红利的减少、劳动力、土地和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使得许多行业的利润率越来越薄,一些原本做实体经济的民营资本移民意愿萌生。

因此,对于中国这个“橄榄型社会”大步转型的国家而言,如何通过更好的机制和更好的福利环境把财富(物质财富和人才财富)留住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议题。对于很多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而言,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打破垄断、制度保障的经济自由、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等,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应该扩大对内开放,通过制度安排让市场真正发挥其在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公平竞争,提高经济效率,降低中国整体宏观税负,构建有益于民间投资的经济生态体系,把中国的民间财富留住。

而把人才留住要靠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比如加大教育制度、就业制度以及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法规,构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和“藏富于民”的收入分配机制,为人才财富可持续发展扫除制度障碍,加快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教育培训政策,真正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战略上来。

应该说,国际移民与经济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人才全球化相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更反映了资源全球化配置的需要。然而近些年,中国如此之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所引发的“汹涌现象”值得高度关注,移民潮不仅造成了中国的财富流失、人才流失、税收流失、消费流失,更对中国“橄榄型社会”的建立造成深远的影响。

不断加速的“海外移民潮”与中国“低福利”的大背景有关。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国民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30%。比如,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2007年政府支出的福利支出(包括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等)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高达68.8%、58.7%、56.7%和57.1%,而我国2009年中央财政中的社保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分别为7.6%、2.7%、4.5%。

然而,对于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的倾向和成本而言,投资环境和创业环境可能是更加重要的因素。投资移民最主要的还是看重发达国家相对宽松的创业制度环境,美国相对而言是快速发展的小型公司最理想的创业成长地之一。金融危机以后,为提高全球竞争能力,美国采取了诸多鼓励投资政策,如提供长期低息或无息贷款,提供劳务、投资和培训服务等。对于在非中心地区、边远地区和经济开发区投资的企业,美国政府还提供特殊的优惠政策。与之相比,国内与创业相适应的创业孵化体系、风险投

资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分配与激励制度等一整套的制度结构尚不成熟,体制障碍构成了创业的基本制度性约束。

当前,国内企业的经营压力越来越大,一方面,国有资本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垄断和要素控制力,民营资本缺乏应有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由于红利的减少、劳动力、土地和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动下逐步回补,使得许多行业的利润率越来越薄,一些原本做实体经济的民营资本移民意愿萌生。

因此,对于中国这个“橄榄型社会”大步转型的国家而言,如何通过更好的机制和更好的福利环境把财富(物质财富和人才财富)留住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议题。对于很多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而言,好的制度依靠的不是政府的经济反哺,而是打破垄断、制度保障的经济自由、产权自由和流动自由等,让更多的要素流动起来,应该扩大对内开放,通过制度安排让市场真正发挥其在配置社会资源,促进公平竞争,提高经济效率,降低中国整体宏观税负,构建有益于民间投资的经济生态体系,把中国的民间财富留住。

而把人才留住要靠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比如加大教育制度、就业制度以及养老保障制度的改革,完善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法规,构建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和“藏富于民”的收入分配机制,为人才财富可持续发展扫除制度障碍,加快实施人力资源开发政策和教育培训政策,真正转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战略上来。

应该说,国际移民与经济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人才全球化相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更反映了资源全球化配置的需要。然而近些年,中国如此之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所引发的“汹涌现象”值得高度关注,移民潮不仅造成了中国的财富流失、人才流失、税收流失、消费流失,更对中国“橄榄型社会”的建立造成深远的影响。

不断加速的“海外移民潮”与中国“低福利”的大背景有关。据统计,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国民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30%。比如,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2007年政府支出的福利支出(包括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等)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高达68.8%、58.7%、56.7%和57.1%,而我国2009年中央财政中的社保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分别为7.6%、2.7%、4.5%。

## 移民潮不利于“橄榄型社会”的建立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张莱楠

近几年,中国海外移民潮所引发的“财富”正引发各界对中国财富管理的担忧。从劳工移民、留学移民到如今以智富阶层为主力的技术移民、投资移民,中国已经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由于投资成本较低、成功率首、获批较快而成为中国投资移民的首选地。据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统计数据,2009财年度,通过在美国投资至少50万美元而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即“绿卡”)的投资移民签证获批人数同比增长了3倍。其中,来自中国的投资移民增长最为迅猛,占比近五成。2010财年,中国共有超过7万人获得美国绿卡,仅次于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

招商银行与贝恩资本最新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累积投资移民的人数最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达73%。其中,约有27%的受访者已经完成投资移民,而正在考虑投资移民的受访者占比达47%,中国投资移民的趋势还在加强。

事实上,在国际移民大潮中,近几年中国海外移民呈扩大趋势,中国社科院2007年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就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而成为最大移民国的同时,中国知识精英的流失也成为全球之首。自1978年以来,中国有107万海外留学生,只有27.5万人回国,而有近四分之三的人才流失海外。

国际清算银行给出了一些回答,它表示,如果政策措施是“值得信赖的”,那么政府可以通过承诺在未来削减赤字,来避免复苏进程受损。该建议做远比说难。国际清算银行还表示,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世界“将能拯救旧世界”。这或许会实现,但是这些国家目前的通胀率高企,印度目前的通胀率在9%左右。(《华盛顿邮报》,吴心轲编译)

国际清算银行给出了一些回答,它表示,如果政策措施是“值得信赖的”,那么政府可以通过承诺在未来削减赤字,来避免复苏进程受损。该建议做远比说难。国际清算银行还表示,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世界“将能拯救旧世界”。这或许会实现,但是这些国家目前的通胀率高企,印度目前的通胀率在9%左右。(《华盛顿邮报》,吴心轲编译)

国际清算银行给出了一些回答,它表示,如果政策措施是“值得信赖的”,那么政府可以通过承诺在未来削减赤字,来避免复苏进程受损。该建议做远比说难。国际清算银行还表示,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世界“将能拯救旧世界”。这或许会实现,但是这些国家目前的通胀率高企,印度目前的通胀率在9%左右。(《华盛顿邮报》,吴心轲编译)

国际清算银行给出了一些回答,它表示,如果政策措施是“值得信赖的”,那么政府可以通过承诺在未来削减赤字,来避免复苏进程受损。该建议做远比说难。国际清算银行还表示,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世界“将能拯救旧世界”。这或许会实现,但是这些国家目前的通胀率高企,印度目前的通胀率在9%左右。(《华盛顿邮报》,吴心轲编译)

国际清算银行给出了一些回答,它表示,如果政策措施是“值得信赖的”,那么政府可以通过承诺在未来削减赤字,来避免复苏进程受损。该建议做远比说难。国际清算银行还表示,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世界“将能拯救旧世界”。这或许会实现,但是这些国家目前的通胀率高企,印度目前的通胀率在9%左右。(《华盛顿邮报》,吴心轲编译)

国际清算银行给出了一些回答,它表示,如果政策措施是“值得信赖的”,那么政府可以通过承诺在未来削减赤字,来避免复苏进程受损。该建议做远比说难。国际清算银行还表示,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世界“将能拯救旧世界”。这或许会实现,但是这些国家目前的通胀率高企,印度目前的通胀率在9%左右。(《华盛顿邮报》,吴心轲编译)

国际清算银行给出了一些回答,它表示,如果政策措施是“值得信赖的”,那么政府可以通过承诺在未来削减赤字,来避免复苏进程受损。该建议做远比说难。国际清算银行还表示,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世界“将能拯救旧世界”。这或许会实现,但是这些国家目前的通胀率高企,印度目前的通胀率在9%左右。(《华盛顿邮报》,吴心轲编译)

国际清算银行给出了一些回答,它表示,如果政策措施是“值得信赖的”,那么政府可以通过承诺在未来削减赤字,来避免复苏进程受损。该建议做远比说难。国际清算银行还表示,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世界“将能拯救旧世界”。这或许会实现,但是这些国家目前的通胀率高企,印度目前的通胀率在9%左右。(《华盛顿邮报》,吴心轲编译)

国际清算银行给出了一些回答,它表示,如果政策措施是“值得信赖的”,那么政府可以通过承诺在未来削减赤字,来避免复苏进程受损。该建议做远比说难。国际清算银行还表示,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世界“将能拯救旧世界”。这或许会实现,但是这些国家目前的通胀率高企,印度目前的通胀率在9%左右。(《华盛顿邮报》,吴心轲编译)

国际清算银行给出了一些回答,它表示,如果政策措施是“值得信赖的”,那么政府可以通过承诺在未来削减赤字,来避免复苏进程受损。该建议做远比说难。国际清算银行还表示,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世界“将能拯救旧世界”。这或许会实现,但是这些国家目前的通胀率高企,印度目前的通胀率在9%左右。(《华盛顿邮报》,吴心轲编译)

国际清算银行给出了一些回答,它表示,如果政策措施是“值得信赖的”,那么政府可以通过承诺在未来削减赤字,来避免复苏进程受损。该建议做远比说难。国际清算银行还表示,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世界“将能拯救旧世界”。这或许会实现,但是这些国家目前的通胀率高企,印度目前的通胀率在9%左右。(《华盛顿邮报》,吴心轲编译)

国际清算银行给出了一些回答,它表示,如果政策措施是“值得信赖的”,那么政府可以通过承诺在未来削减赤字,来避免复苏进程受损。该建议做远比说难。国际清算银行还表示,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世界“将能拯救旧世界”。这或许会实现,但是这些国家目前的通胀率高企,印度目前的通胀率在9%左右。(《华盛顿邮报》,吴心轲编译)

国际清算银行给出了一些回答,它表示,如果政策措施是“值得信赖的”,那么政府可以通过承诺在未来削减赤字,来避免复苏进程受损。该建议做远比说难。国际清算银行还表示,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世界“将能拯救旧世界”。这或许会实现,但是这些国家目前的通胀率高企,印度目前的通胀率在9%左右。(《华盛顿邮报》,吴心轲编译)

国际清算银行给出了一些回答,它表示,如果政策措施是“值得信赖的”,那么政府可以通过承诺在未来削减赤字,来避免复苏进程受损。该建议做远比说难。国际清算银行还表示,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世界“将能拯救旧世界”。这或许会实现,但是这些国家目前的通胀率高企,印度目前的通胀率在9%左右。(《华盛顿邮报》,吴心轲编译)

国际清算银行给出了一些回答,它表示,如果政策措施是“值得信赖的”,那么政府可以通过承诺在未来削减赤字,来避免复苏进程受损。该建议做远比说难。国际清算银行还表示,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世界“将能拯救旧世界”。这或许会实现,但是这些国家目前的通胀率高企,印度目前的通胀率在9%左右。(《华盛顿邮报》,吴心轲编译)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富人的收入和财富相当可观。胡润《财富》杂志2010年的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千万富豪人数达87.5万人,他们仅在休闲花费上,平均年消费为190万元人民币,亿万富豪平均为250万元。据此匡算,我国富人应缴纳的个税所得税应在8000亿元以上,是目前个人所得税额的2倍多。可见,加强对个人收入的监控,完善监管机制,使个税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真正发挥出来势在必行。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富人的收入和财富相当可观。胡润《财富》